

从应用文的历史沿革看应用文文化的价值

三峡大学 方才勤
葛洲坝外国语学校 张瑞华

自人类文明萌芽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就在杂交互动中发展，而且这种杂交互动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有时表现为直接，而更多的则是间接的、深层次的。而应用文在人类发展史中开了历史的先河，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人类除文艺创作之外的写作，都属于应用文写作的范围。因此，我们认为谈应用文，必须首先认识到它是文化，而且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大文化进步的工具，是这两大文化结合的助推器。

应用文文化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也是自然科学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人去把它变化、转化而成的，这就是“人文化成”，只是转化而成的形式不同罢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于是变化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于是“化成”了自然科学。这两种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始终是相互依存、交融互补的。它集中体现在科学大师们的身上，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既是科学大师，也是人文大师，应用文写作则融于科学家科学创造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说科学家科学创造过程中的设计、规划、说明等等都是以应用文文化去体现的，但他们又得益于人类的人文文化的补充激发。每当我们关注那些成就卓著的科学大师时，就会发现，他们越是接近科学艺术，他们从文学艺术宝库中获取的营养也越丰富，他们也就更容易创新出优异的科学成果。

一 应用文的历史沿革

应用文写作源远流长，它和文字同步，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具有原始应用文的雏形。这些文字为占卜所用，故称为《卜辞》。《卜辞》广泛记载了奴隶制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国家的政治、军事、祭祀、狩猎、农业等的活动，文字古朴，记录简炼。

春秋时期，相传孔子把上古时代的历史文件汇编成《尚书》，其中收录了唐、虞、夏、商、周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书，为我国公文写作开了先河，对后世公文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论语·宪问篇》中记载了孔谈到的当时文件起草加工的情况：

随着历史的发展，应用文的品种不断增多，体式也更完备。秦汉时期，民间的应用文有：书、启、呈、状。用于朝廷上对下的应用文有制、诏、策等；下对上的应用文有章、奏、表、议等四种。

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出现了研究应用文特点和写作要求的文章。其中曹丕

有首创之功，他在《典论·论文》中把章分为四科八类，前三科六类都是应用文，并提出“雅、理、实”的写作要求。同时，他还高度重视应用文的实用价值：“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甚事”。陆机的《文赋》，又将文章分为诗、赋、碑、谏、铭、箴、颂、论、奏、说十类，对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各类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求作了概括和阐发。文论家刘勰所撰《文心雕龙》的文体部分，详细论述了说、盟、铭、谏、碑、哀、吊、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等35种应用文的起源、演变、代表作品和写作特点，对后世应用文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宋时期，应用文进一步向前发展。下行文书有制、敕、册、令、教、符；上行文书有表、状、笺、启、辞、牒；平行文有关、移、刺。其中辞、牒、关、刺为唐代特有。宋代，公牒体制也有一些变化，如创设了诰命、御札、刺、旁、故牒、呈状、申状、笞子等体式。

元明至清代，应用文继续发展，各个朝代都有删除和增添。如清代规定了上奏的本章均须贴黄（内容提要），还增加了外交文书“照会”。

在丰富的应用文宝库中，除了历代的公务文书外，还有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多种应用文：书、记、规、志、序、跋、铭、箴、谥、诛、碑文、墓志、墓表、祭文等。

值得一年的的是在我国应用文发展史上，曾经产生了不少传世佳作。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晁错的《论贵粟疏》、贾谊的《论积贮疏》、曹操的《让县自明李志令》、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轼的《教战守策》等等。这些优秀篇章，由于表达感情真挚，语言优美，有的还有生动的事例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因而被看作是文学作品，为我国文学史增添了光彩。

由此可知，自古及今，应用文文化就渗透到了人类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它是那样的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 应用文文化的价值

宋代蒋捷有一首词名叫《一剪梅·舟过吴江》，其中有一名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江南风景图。可是，如今江南的这一美景，因酸雨的污染风光不再了。所谓“酸雨”，指含有一定数量的酸性物质的雨、雾、雪、雹。酸雨侵蚀物体，污染环境，为公害之一。酸雨问题是亟待解决的世界难题，我国也不例外。为此，李政道博士（诺贝尔奖得主）曾于1999年4月、5月间在苏杭一带考察、讲学，看到了这一严重的事实后，提笔致函朱镕基总理，请予关注并要妥善处理。幽默的提议，蒋捷名句“或可略改几字”，改为“酸雨容易使人伤，酸了樱桃，黑了芭蕉”，这一改，色味皆臭，酸雨为害之烈，可见一斑。

从这信息中，我们看到的是多方面的文化的体现。这是一个以人文文化与科

学文化充实起来的科学家在两大文化互动中的思维与思维的产物。这一产物是“函”，“函”就是应用文文化的一类，用函这一工具表现的是科学思维，是科学家的天赋，是科学家的素质。有关资料显示，李政道博士，对诗、词、曲、赋、国画、京剧都有特殊的爱好。

应用文文化辐射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从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金融家、文学艺术家身上都能看到，只是表现的形式有异。我们的应用文文化研究就要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切入点，只有这样应用文文化的研究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应用文文化的发展要用全新的视角去探讨、研究，就像既是科学上的艺术家，又是艺术上的科学家那样去发掘新内涵去研究新问题，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比如北宋的沈括博学能文，通天文、历算、方志、音乐、医药，它的许多科学成果，都记载在他写的《梦溪笔谈》中。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美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赞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数学大师华罗庚，写得一手好诗，曾写出不少科普作品；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特别热爱音乐，他说：“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里面有美学”。画家达·芬奇从绘画实践中，对投影几何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巴尔扎克在其小说中，最早提出“激素”这一概念；小说史家史特林堡在《科尔船长》中竟然提出，直接从空气中制取氧；德国大诗人歌德，发表诗体文的论文《植物的演变》；特别是法国作家凡尔纳，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津津乐道地向人们描绘了实际并不存在的潜水艇、飞机、电动汽车、宇宙飞船、彩色摄影、有声电影和电视等；更令人惊奇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 100 多年前，在其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就写到了当时并不存在的“卫星”。

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称：不论在科技文化的科学上，还是在人文文化的艺术上，解决问题的过程都是大同小异的。

许多事实表明，在科学大师的整体科学世界和全部创造过程中，作为人文文化的文学艺术，始终都在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的启迪作用；作为科技文化的科学，始终是人文化发展的推动力，应用文文化应承担起融入两大文化的历史重任。面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而“两大文化”的分离倾向依然十分严重的现实，通过应用文文化的研究重新构建我们的教材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认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离会导致人的片面化，是“半人教育”。1948 年梁先生曾在清华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过了 17 年，西方学者马尔库塞出版的《单维人》一书，其中也阐述了梁先生的相同的观点。“两大文化”分离是一种畸形化的“半人教育”，这个命题是否为梁先生首创，现尚不得而知，不过早在 19 世纪初德国大诗人席勒就提醒世人注意：人的畸形发展是个陷阱。面对这样的现实，尤其是当今社会 WTO 已形成的社会，作为独立的一门学科的应用文文化应理所当然地要为“两大文化”的全面发展，造就一代新人而大书特书。

由于时间的关系，加之水平有限，谨此开头以抛砖引玉，为我们的应用文文化研究而效力，请记住“文化杂交互动出精品”这是个普遍的真理。面对 20 世纪

初科学发展日趋专门化和技术化的问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类心灵间的封闭等种种社会和思维问题，萨顿对那种“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教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的倾向进行了批评。他指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而且也是改变精神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他还指出，“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样”。（萨顿《科学的生命》）

2003年8月写于三峡大学